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2-0047-05

现代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本质 及其把握方式研究

朱林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当代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本质及其把握方式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大体上形成了三种认识,即“历史重构说”及其心理移情法、“合理应用说”及其意义预期法、“交往互惠说”及其视域融通法。分别来看,这三种把握方式都有道理,因为任何合理解释既需要对文本结构的客观分析和细致甄别,也需要基于主观期待对之进行再创作,更需要读者与作者在交往中实现视域融通并达成共识。但是,只有将其内在地整合起来,才能使文本语义获得深层理解并在更高的普遍性上生长,那些充满瑰丽的诗意之思和深邃隽永的睿智之辩,才能成为当代语言学的生命之源。

[关键词]西方语言学;理解的本质;解释方法

[中图分类号] H0-6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3.02.009

当代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本质及其把握方式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在讨论中大体上形成了三种认识,即“历史重构说”及其心理移情法、“合理应用说”及其意义预期法、“交往互惠说”及其视域融通法。分别来看,这三种把握方式都有道理,因为任何合理解释既需要对文本结构的客观分析和细致甄别,也需要基于主观的意义期待对之进行再创作,更需要读者与作者在交流中实现视域融通并达成普遍共识。但是,笔者认为只有将其内在地整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积极的文本理解。本文拟从学理上厘清当代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本质及其把握方式三种认识,探析当代西方语言学未来发展的大致走势,以期有利于我们借鉴西方语言学发展的积极成果来推进我国语言学的发展。

一、“历史重构说”与心理移情法

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第一种理论认为,理解本质上属于一种历史重构,其方法在于心理移情。如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威廉·狄尔泰、汉斯-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等人就曾经反对在单纯技术环节或者方法层面规定文本理解的本质,并提出一种文本语义的“历史重构说”,认为凡是理解都是历史性的理解,理解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历史性。一部作品只有深深扎根于它的缘由所出的现实生活和文化遗产中,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历史上下文”,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如果作品从特定历史语境中抽身出来并进入历史文化的实际交往时(被不断应用时),作者原意和文本意图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丢失,且不能很好地予以复原。由于经典文本远离了它的原始语境和本然世界,早已变成了不可理解的陌生性的历史传承物和“一种不透明的光”,故而,当代语言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客观地重构这种原始语境和本然世界,尽可能详尽地收集与整理关于经典文本及其原始作者的写作过程、刊布情形以及版本源流和最初设想,以便重构出经典作品的生态原貌及其作者意图。经典作品的内在意涵是文本产生时的那个原初世界所规定、所赋予的,对它的把握和理解,实际上就是对原始文本缘由产

[收稿日期] 2013-01-08

[基金项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研究生培育招标项目(SW:2013-01)

[作者简介] 朱林(1989—),男,河南省开封市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生的原初语境及其文化底蕴的重建或重构。离开经典作品的特定历史视域,文本的任何意义和当代价值都变得不可理解。只有从它的内在本源处和思想发祥地出发,对经典文本所隶属的文化原貌、生活世界进行复制与复原,即通过历史重建和文化复归的方式,才能揭示出经典文本的作者意图和文本结构,才能弥补由于历史间距和时间间距所造成的意义迷失。显然,倡导历史重构方法的学者也意识到,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图有着各自不同的视域间距,二者保持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如果读者从自身存在的当代视域出发,展开对文本意义的当代性理解和应用性诠释,则读者纯粹性、主观化的意义预期将会遮蔽经典文本中所蕴涵的作者原意和文本结构,从而导致要么诠释不足、要么诠释过度的非正当性理解。在对经典文本理解、解释和应用过程中,读者应尽可能悬置自己的主观预期和价值判断,努力借助于心理移情的内在体验来实现视域转换和历史还原。真正的解释既不是按照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实现所谓“化腐朽为神奇”,更不是按照主观预期而肆意地构造新的意义,而是要重新认识作者与他的受众之间的原始关系,使读者设身处地地回到文本生成时的原初氛围中“表一番同情的理解”,准确地进入作者创制文本时的文化根基中,以便彻底消除由于历史间距和时间间距所造成的理解障碍。

然而,吊诡的是,撇开历史重建的复杂性与艰难性不谈,即使能够实现本然如初的意义重构,真正返回经典文本的原生语境和作者原意,对文本实现了真正的历史理解,但这种历史性理解真的能够诠释出文本的实际意义和当代价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一个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典文本的理解来说,重建其借以实现思想生成的各种原始条件,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就理解的一般性前提而言的。其实,真正的历史性理解即便能够实现原始语境的二度创造,再造出来的也不是富有灵性的意义世界,只是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僵尸”而已。因为,时间的流失、文化的交融、文明的演进、社会的变迁,注定了任何真正的历史还原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对历史语境的修补和恢复也都是“无意义的”和“无效的”;被历史重建的、从陌生化转换回来的文化生命,并非原来的真实生命与活的灵魂,赢得的只不过是某种文化的外观,获得的也只是“一种僵死的意义的传达”^[1];而且历史重建只是一种外在性的抽象活动和各种文化碎片的理性杂凑与随意陈列,并不能真正召唤活生生的文化生命的再度

回归,不能实现文本思想的再生与转世,它给予我们的只是对当代现实性诉求的一种朦胧的回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每一个经典文本都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性时空构架,都是对人们生存方式的某种特殊申认,都有它存活的特殊历史情境和内在生命周期,其超稳定结构很自然地造就了它的独特个性、发展形式与存在样态。那么,读者能够通过心理移情真实还原作者当时所处的具体语境吗?即便能够成功回到作者的思想源头,成就的也只是原始文本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又怎样通过爱心、同情心的内在体验而使其独特的精神品质和内在灵魂得以再生与转世呢?可见,如何实现历史重建的同时又确保破除文化系统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及其深层结构中固守着的文化惰性,并升华与活化出一种经典文本中原本蕴含的当代意义,这才是“历史重构说”内部的真正紧张,也是它被“合理应用说”取代的关键之点。

二、“合理应用说”与意义预期法

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第二种理论认为,理解本质上属于一种合理应用,其方法在于“意义预期”。当代西方语言学家,如保罗·利科、卡尔-奥托·阿佩尔、姚斯等人认为,在进行语义诠释或者理解时,能否执行一种跨文化理解和对话的策略,对把握一个文本的复杂性语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每一种文本都必须被理解,理解本质上属于一种语言学的自觉运用,文本学必须并入语言学而且被视为语言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文本的语义才能因为获得合理解释而生成。伽达默尔也认为,一切文本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僵死的语义)向有生气的“意义活体”转换,文本的意义域、信息域是在其获得的对话和理解中不断自我生成的,它的复杂性的意义结构也是随着阅读者恰如其分的接受不断得以向深层开掘的,换言之,文本有没有意义或有什么意义,“完全在于理解者如何接受”^[2](P342)]。即使是对于那些历史性的经典文本的语义生成,阅读和理解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二者一同被视为颇具语言学意义的精神性事件。解释和理解是同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要达到理解必须要通过解释,而解释中理解无处不在,解释和理解其实水乳交融、内于一体。二者统一的过程其实就是文本被应用、意义被增殖的过程,只有在应用中的解释才是最高意义上的解释,只有在理解中的应用才是最恰当的应用。任何理解都是应

用性的,理解的本质就在于应用。现代语言学在理解基础上分析语义及语用问题时,反对那种“语义客观外在说”,从不主张有一个纯然外在的原始语义能够普遍地被应用到各处,更不认为读者只有完全悬置自己的主观意见才能去做纯粹性的理解。恰恰相反,读者往往是通过应用才达到合理理解的。理解、解释和应用三位一体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凡理解都是相互理解、科际合作,凡解释都是跨文化交流、创造性的生成,凡应用都是合目的、合规范的自觉应用。积极的应用无论对于作者抑或读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导因素,任何一个文本语义总是与它在某种具体范围内的实际应用中一道被显发、被照亮的,没有真正的应用,再完美的语义也不可能被接受。可见,语用学知识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本诠释中,值得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一般性的诠释学基础问题加以探讨。

理解的应用性或者实践性本质表明,对文本的理解其实就是对文本意义的主观预期,是解释者对生活经验的未来可能性的一种筹划。文本的意义并非为文本自身所固有,并不存在一个纯然的客观外在的作者原意或文本意图,文本意义是在与读者的接受关系中产生的,并随着解释者主观预期的变化而变化,一切都取决于解释者意义预期的能力与水平,离开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筹划与预期,就不能实现任何积极的意义接受与合理应用。进一步说,文本在与读者的接受关系中能够产生的意义并非只有一种可能性而是有许多种可能性,究竟哪一种可能性的意义能够实现,这完全取决于主观预期的方向和意义筹划的性质。文本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应用,它不是一个意义自足性的完成物,而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它充满着各种各样为人所用的可能性,而积极正当的理解就是对各种可能性做出恰当选择与最佳规划,在应用中获得合理理解,在合理理解中获得内在超越。可见,理解就是在文本的各种可能性中通过主观预期而筹划新义,没有应用就没有理解,应用是理解的本质构成,换言之,理解与应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于任何理解都存在自己的前结构、前理解,任何应用也都存在自己的诠释学处境,因而理解与应用总是根植于解释者先前已有的东西,以某种预先假定的意义预期为前提、以某种先行理解和先入之见为基础。解释本质地建立在前把握之中,任何解释都是主观期待与实际应用的结合。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理解都包含着对自身的筹划,都是对主观预期的意义做出理解。^[3]谁理解,谁

就是在理解自己,也就是按照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去筹划。而谁理解文本谁就是对之进行意义筹划,一旦这个最初筹划的意义在文本理解中出现了,解释者实际上就为整个文本的理解定下了基调,并带着这个意义的整体期待做出全面的理解。主观期待好像是“过早行动”,它为理解这个文本预先筹划了一种意义,作为一种内在牵引力促使解释者按照自我规定的方向做出解释,理解说到底就是对主观意图的自我理解。当然,这种前理解也有可能出错,但是持续不断的深入理解总是在对意义预期做出合理的修正,理解不是一成不变的,解释者也并非顽固地坚持其前理解,而是时时处处保持理解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是双向的,不是要求理解者放弃自己的前见,而是将之带入理解中并整合到文本所启示的内容上,从而实现文本意义的自我生成。

三、“交往互惠说”与视域融通法

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第三种理论认为,理解本质上属于一种交往互惠,其方法在于视域融通。在尤尔根·哈贝马斯、迈克尔·福柯、理查德·罗蒂等人看来,其实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僵化、静态地凝固在原始文本中,也不是纯粹主观上心灵预期的结果,作者意图、文本原意与读者的主观预期和积极应用密不可分。对文本的理解和诠释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作者和读者围绕文本意义的开发不断展开对话与交流的过程,而不是读者摆脱一切先见聆听作者心灵独白的体认过程。作为理解和诠释的积极成果,文本意义的自我生成、自我创造与不断增殖,不是对作者意图或者文本原教旨意义的简单复归,而是在作者意图和读者期待这两种视域的交互作用、双向交流下产生的交往互惠、重叠共识。凡理解都是通过对话而进行的精神交往,交往性是理解的本质属性,或者说理解本质上就是交往。具体说来,首先,任何一个文本新义被诠释,都是作者意图、文本意图与读者意图交往互惠的结果,只有当文本意图和作者意图与解释者的积极理解、合理应用相结合时,才能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离开了真正的理解和应用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文本是用于被理解、被应用、被创造的,读者预期参与了作者对文本意义的一同创造,离开读者的意义接受,文本意义归于零。其次,任何一个文本,从根本上说都是未完成性的,都具有许许多多的未定点和空白处。只有通过多种视域的融通,解释者通过主观性的预期、想象性的理解与合理性的应用,才能将这些未定点和空白处填充

并丰富起来,为文本再造出各种各样的活生生的意义来。再次,文本意义并非自在的存在体,任何文本都没有单独存在的权力,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脱离解释视域的文本原意。文本意义不是等在那里需要读者客观性地予以描述和再现,而是与解释者的理解一同存在、一同生成的,若没有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的积极筹划和善的选择,若撇开解释者不断从当下的可能性向着未来推进,文本就是一堆毫无价值、不可理解的文化垃圾。只有通过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问答和质疑,唯有在问答逻辑中发生思想交往,积极的理解与合理的应用才能使文本意义从死的语言材料中脱离出来,变成具有现实意义的时代精神与活的灵魂。最后,文本理解总是受主观预期之“流动视点”的制约。解释者的意义期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前理解和前结构也总是不断被作者意图和文本结构所修正,这样,基于意义期待而形成的内在牵引也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引领着解释者向前、向上地做出善的选择和意义提升,不断在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读者意图的内在本质处实现通约、达成和谐。

对于同一文本,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读者,基于不同的而且是流动的意义期待(流动视点)获得不同的理解。而一个文本所潜在的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读尽,只有在不断发展的接受过程中为不同读者所不断挖掘。这表明,理解不仅是历史的,同时又是现代的;不仅是作者的创造,而且也是读者的创造。文本意义在本质上既隶属于历史又隶属于当代,是历史与当代的意义汇合,是作者意图与读者意图的内在融通。因为,理解不仅要以前理解为基础,而且要基于主观期待经常对之实现意义增殖;解释不仅要以前理解为根基,而且在它的内在牵引下还要对当前的可能性做出合理的未来筹划。当读者以自己的当代视域去理解作者的原始意图和文本结构时,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读者意图就发生内在紧张甚至会导致相互对立,只有各自放弃自己的片面性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视域整合,才能构成一种新的和谐或者深层通约。合理的诠释,事实上就是一种基于视域融合的内在沟通与合取向;也只有通过视域融通才能克服各种意图的局限性,使得理解能够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上升,在历史基础上产生普遍交往的合理化,真正实现跨文化交际和主体间共识。

总之,只有在视域融通的意义上,将这三种把握方式整合起来,才能获得积极合理的理解。因为,文

本理解的视域融合也存在限度问题,正像交往存在“伪交往”^{[2] (P329)}与合理交往一样,视域融通也存在文本如何实现内在契合的性质问题。提高文本之间、意图之间的契合度,既依赖于对文本语境的历史还原、语境重建和语义复归,更需要提高文本之间和各种意图之间与当代实践视域的相关度、参与度,唯有将作者原意、文本结构与读者期待一同融入到实践视域中,实现文本逻辑、问题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在文本所代表的普遍性指向与读者现实处境的特殊性指向之间建立一种双向性的实践批判关系^[4],才能使这种双向理解向更高的层次跃迁,使文本语义在更高的普遍性中生长。

四、三种把握方式的内在整合与未来走势

当代语言学关于理解本质及其把握方式的研究,无论是“历史重构说”及其心理移情法、“合理应用说”及其意义预期法,还是“交往互惠说”及其视域融合法,都重视语言学的主体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强调对理解及其本质问题要在应用中予以激发与活化。事实上,离开合理而积极的文本理解,语言的意义构造及其逻辑关系的每一步推理都无法准确进行,文本的真义就会枯竭、思维灵性就会堕落、生活语义就会低迷。若语言学中的生活语境不能使人的心灵睿智在享受快乐中产生灵异和飞动,就很难成为一切文化的艺术之母和思想创新之源。唯有实现文本理解之上述三种把握方式的内在整合,那些充满瑰丽的诗意之思和深邃隽永的睿智之辩,才内在构成当代语言学的生命之源并为之注入强大的活力。

唯有实现三种把握方式的内在整合,才能产生和推动语言学的原发动力,激活与驱动思维的固有能量,放大表述对象的意义蕴含,使人的精神境界处于高峰体验状态,不失时机地扑捉到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使之灵思泉涌。语言学获得创新的源泉既需要历史重构又需要视域融通,但是只有在合理理解基础上,才可以将人带入一个虚拟世界,构造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意境,使人的思想在享受快乐、享受惊奇、享受自由中激发出少有的灵性和飞动,产生“思极则奇”的语言召唤力。语言学史上的那些思想家们大都是些富于心理移情和视域融通的人,他们总是积极主动地使用合理想象进行意义构境,在思入生活时总是用它开道,在理想的遥远彼岸获得启示之后再返回到现实之中,因而其当代语言学

思想的跨度极大,获得的是一种思维的跳跃和瞬间的灵感。^[5]

在未来发展上,当代语言学关于理解本质及其把握方式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历史重构”、“合理应用”和“交往互惠”的视域整合,每一个语言学的当代理念都要靠这种整合来养育。如果缺乏对新语言元素的整合和对当代语义的召唤,就会使人类的语言学智慧走向委顿。如果一个语言学者丢掉了合理理解、意义预期这种可贵的思想品质,而仅仅面向符号本身的奇迹进行抽象致思,就会导致人类灵性的堕落和担当意识的飘散,这才是人类文明开始走向衰落的真正征兆。进一步而言,如果语言学者缺乏科学语言观指引下的内在整合机制,他的语言学操作就会产生病态的语素、尴尬的语境、失真的语义,无法提供合理应用语言的充足理由。缺乏对语言世界的意义整合也很难拔高人的文化交往质量,并使其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6]人类凭借当代语言学的合理理解方法,对可能性的未来文化世界实现视域整合,将为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基,这是人类语言学思维发展的关键性环节。一般来说,“历史重构”、“合理应用”和“交往互惠”的实际整

合能力,就是现代语言学思维所能达到的深度,没有一种思想能力比合理理解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入研究文本本身。现代语言学的生活语境及其对人性的善的选择和对诗意存在的开敞,是打开人的一切能动的活知识大门的金钥匙,是一切创造力和智思之流的必由之路,是人类灵魂得以净化和飞升的奥妙玄机。

[参 考 文 献]

- [1] 洪汉鼎.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8.
- [2]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3] 朱林.略论西方语系的内在悖论及后学语义对它的解构[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1):66.
- [4] 彭启福.文本诠释中的限度与超越——兼论马克思文本诠释的方法论问题[J]. 哲学研究,2007(2):18.
- [5] 舒开智,叶若兰.走出语言的牢笼——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形式主义文论作者消解论批判[J]. 殷都学刊,2009(3):106.
- [6] 朱林.现代经验主义的语言学转向及其对形上语义的消解[J]. 开封大学学报,2012(4):60.
- (上接第25页)
- 我们需要弘扬基于文化差异的输出理念,打造弘扬优秀中原传统文化的知名品牌,建立以译介为主的多元输出方式,将优秀的中原传统文化推广到区域外,以中原传统文化精神引领区域外群体,增强中原经济区的软实力。
- [1] Joseph Nye. 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EB/OL]. (2011-03-31)[2013-02-16].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11-03/content_12252669.htm.
- [2] 马庆国,楼阳生.区域软实力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3] 秦琴.区域软实力研究述评[J]. 商业时代,2012(31):126.
- [4] 谈新敏.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的现时代意义[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2.
- [5] 骆玉安.论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和特征[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86.
- [6] 王凤玲.中原传统文化传承三路径[J]. 求索,2010(4):72.
- [7] 新浪新闻中心.2011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分析报告[EB/OL]. (2012-08-29)[2013-02-15]. <http://news.sina.com.cn/m/2012-08-29/121325059691.shtml>.
- [8] 谢华.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误读的合理性与不可避免性[J]. 江西社会科学,2006(1):186.
- [9] 包通法.论汉典籍哲学形态身份标识的跨文化传播[J]. 外语学刊,2008(2):120.
- [10] [美]爱德华·W·索杰.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刘佳林,朱志荣,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11]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 [12] 季羨林,张光璠.东西文化议论集[C].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